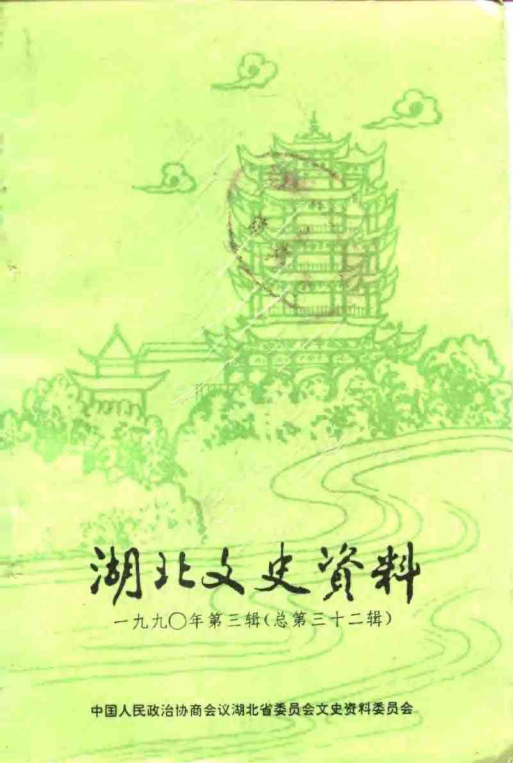




湖北文史資料

一九九〇年第三輯(總第三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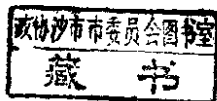
H124/31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〇年第三辑

(总第三十二辑)

科技文教史资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湖 北 文 史 资 料

(季刊 1980年创刊)

1990年第8辑(总第32辑) 1990年9月出版

出版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者：湖北省浠水县印刷厂

发行者：《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开 本：850×11681/32 印张：7.5

字 数：19万字 印数：60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67定价：2.20元

目 录

甘苦相随四十年——缅怀朱士嘉先生·····	骆麟声 (1)
我的水利生涯·····	曹乐安 (17)
建国前湖北气象科技八十年·····	罗昭彰、孙承训 (29)
清末陆军贵胄学堂第二期的回忆·····	韩世儒 (39)
武昌的武普通中学堂的概况·····	李愈友 (50)
湖北的书院概说·····	李骥五 (56)
辛亥革命前后的私塾生活·····	王楷元 (61)
私塾生活的回忆·····	范鸿勋 (66)
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记·····	艾毓英 (71)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剪影·····	贾修龄 (79)
创办于崇阳高视的湖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	沈维正 (84)
抗战前湖北省中等学校毕业会考一瞥·····	熊连成 (91)
抗日时期湖北“联中”生活纪实·····	王言生 (94)
献身教育的朱伯柏·····	刘忠武、白万贵 (100)
我所经历的教会学校·····	李辉祖 (112)
记武昌华中大学·····	艾玮生 (124)
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徐家麟 (133)
武昌文学书院的回忆·····	段继李 (140)

信义神学院始末·····	陈殿芝 (149)
记汉口博学书院·····	王拱元 (153)
三十年代初期的武汉新闻界·····	徐铸成 (157)
崇文书局刻书始末·····	孔毅 (160)
我的声乐生涯·····	喻宜萱 (165)
张均的印度舞蹈·····	祝和忠 (210)
黄梅文曲坐唱的历史概述·····	桂遇秋 (221)
英山采茶戏概说·····	张元骧 (234)

甘苦相随四十年

——缅怀朱士嘉先生

骆啸声

珞珈化雨铭心骨，海澱相期报国恩，

心有灵犀通一点，盼来枯树又逢春。

这是我和朱士嘉先生甘苦相随四十年的写照。

先生于1989年12月28日仙逝，噩耗初传，我因无限悲痛，忙于主持先生治丧，未能写篇悼念文章。随即旧病复发，长期住院，其间曾一再考虑动笔，又因病情几经反复，力不从心，每以为憾。近来病情稍事稳定，仅就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终身难忘的一些事情，写成一篇挂一漏万的回忆，敬献于先生在天之灵！

珞珈化雨铭心骨

1950年8月，先生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当时，我是武大历史系的学生。新学年开始了，我拿着选课证，聆听历史系系主任吴于廑先生对新来教授的介绍。吴先生盛赞朱士嘉博士，学识渊博，学术成果累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成为饮誉国内外的方志学家、文献目录学家，曾著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在《禹贡》半月刊和《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地方志的文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赏。抗战初期，朱博士应聘去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工作和深造达十一年之久。朱博士热爱祖

国，新中国建国伊始，毅然辞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职务，投奔解放。此次受聘来我系任教，开设“史料整理实习”这门新的选修课，希望同学们踊跃选读。吴先生这一简短的介绍，使我对先生产生仰慕之情，选了这门课，当上了先生的学生。

“史料整理实习”这门课，是以中美关系史和武昌首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先生把具体历史资料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讲授，树立了教书育人人的典范。

中美关系史又是以揭露美国拐骗和迫害华工的惨景为其主线的。1948年春，先生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展览会，偶然发现该馆藏有《道光皇帝给美国总统泰勒书》，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为了查明该馆馆藏有关中国的情况，先生弄到了一张“美档”的阅览证，找到了《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发现其中记载一件拐骗和迫害华工的中文档案。随即穷追不舍，又从美国驻厦门、汕头、上海、香港、澳门等领事馆中，发现更多的拐骗和迫害华工的中文档案。先生激于义愤和爱国热比，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美国帝国主义这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暴露在青天化日之下，使全世界人民认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的狰狞面目，特别是教育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国人。为此，先生牺牲了三年业余休息时间，从三百多册档案中，找到并复制一千多页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胶卷。

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中，先生还找到并复制了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公使柯新与清廷订立第一个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的照会，天津义和团打败美、英、俄国洋兵的木刻画，特别是1900到1904年之间绘制的，美国驻广州领事收集到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图》，图上，画着狗熊，代表沙俄，占据蒙古；画着老虎，代表英国，卧枕长江流域；画着老鹰，代表美国，扑向东南；画着青蛙，代表法国，坐实越南，前爪伸向西南；画着太阳，代表日本，罩住东北；画着回肠，代表德国，盘

围住威海卫；画着睡人，代表清廷，麻木不仁，任人宰割。图的两侧，写着“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八个大字。

在“史料整理实习”课堂上，先生就是运用这些档案资料和实物图片进行教学。让历史事实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而且还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令人终身难忘。凡是选读过先生这门课的同学，无不痛恨美国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收到了寓史学于爱国主义之中的良好效果。

“史料整理实习”课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武昌首义，也是武汉地区高校历史系学生研究的课题之一。当时亲自参与辛亥首义的老人，大都耄耋之年，为了继承民主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了抢救“活资料，”先生组织我们去采访。我们学生准备好采访提纲，经先生审查就绪，届时，集中到武昌乃园的辛亥革命老人约有十来位，分成两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每位老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学生也与之相应分成两个小组，便于记录和提问。老人们所讲述的亲身参与武昌首义的情况，极为生动，使我们如身历其境，受到很大教育。先生对这次调查采访活动很满意，此后，便选中了我作为他的助手。

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助先生五百元科研经费，整理他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复制的中美关系中文档案胶卷。我被先生提名、学校批准，以教授助理的名义作为先生的助手。每天下午课余时间，我到先生住处半山庐，在他的指导下，利用他从美国带回的显微胶卷阅读器，用电光将胶卷胶大，字迹清晰地印在阅读器的底部，逐字逐页誊抄。

我和先生接触的时间多起来了。我敬重先生，先生爱我。在珞珈山相处三年中（1950年9月——1953年8月），师生感情融洽，知无不言，无所隐私。知我者莫若先生，知先生莫若我。先生热爱祖国、不同流合污的思想情操，非自一日始。

先生生于动荡国事之秋，家境清寒，自幼参与家务劳动，爱

乡爱国，好学，有正义感。

先生在江苏无锡县城上竣实小学时，校长朱澄清讲鸦片战争，激怒先生最痛恨英国人；讲甲午风云，促使先生更仇视日本人。“五卅”惨案时，先生走出上海之江大学课堂，投入反日爱国运动的行列，积极募捐救济殉难家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年轻的先生，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走出燕京大学宁静的书斋，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反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宣传他的导师，著名的爱国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办的“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出版的《傀儡皇帝坐龙廷》、《义军女将姚瑞芳》、《打汉奸》等多种小册子，反对日本侵略我国。同时，对国民党“不得抵抗”的投降政策，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平，美国人办的燕大校园，未受惊扰，尚能保持相对的安静。先生忍气吞声，不愿当亡国奴，坚持隐蔽斗争。随即爆发的“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犯上海，飞机轰炸闸口，东方图书馆藏书被烧毁（内有孤本方志多种），我写了关于《孤本方志被炸毁》的报导，刊登（在）《燕京学报》，表示我对日寇的无比愤慨。”（朱士嘉《研究方志的历史回顾》，1988年春给研究生讲课手稿）日本东方文化研究委员会成员桥川时雄，慕名而来，以高薪待遇邀请先生去编写《中国方志提要》和《当代中国人物总览》两书，被先生断然拒绝了。

先生曾由他的导师、著名爱国教授洪煊荪先生（活到八十多岁，老死在美国，拒不加入美国籍）介绍，结识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恒慕义主任。1939年9月，恒慕义函托洪教授，邀请先生去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编写《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工作。先生去美后，用了三年（1939——1942年）时间，完成了编目和抄写（当时没有中文打字机）任务。该书著录二千九百多部中国地方志，1942年，由美国政府印刷局将先生手抄本石

刊出版。这些中国地方志，大都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通过美国驻华领事馆在中国各地收走的；有的是从中国流入日本开设的中国古旧书店市场上买到的。其中有珍本方志，特别是美国农村部高级官员从广东地方志中发现良种柑橘及其种植方法，就将这部方志连同当地生长的土和苗，一起带到美国去了。先生对此，心情难以平静。“文革”期间，这部书的手抄石印本，连同张国淦先生遗稿一百册等珍贵资料、手稿和几十年积累起来中外图书，悉数抄走，至今查无下落。先生每忆及此，感到是他个人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个损失，痛心不已。1987年春节期问，先生在我家书柜里，发现先生于1951年赠送给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一书，喜出望外并告知“1985年台湾新文丰出版社老板，以为我不在了，不顾‘版权所有’的规定，擅自重印”，表示气愤。我欣然应先生之请，书归原主。先生深表谢意，并立即另撰《简介》一文，连同1942年石印本，寄请李一氓同志审阅，李批准交由中华书局影印。由于出版时间长，先生生前未能见到重印本。我得到这本书，是由先生夫人程含玉老师遵嘱赠给的。睹物思人，怀念先生之情，久久不能自己。

先生初到美国，受到恒慕义的尊重。恒慕义素仰顾颉刚和洪煊莲两师的品学，对他俩的高足朱士嘉先生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很高兴。他告知《华盛顿明星报》报社的负责人说：“我从中国请来了一位专家。”该报社派出记者来访问先生，给先生拍了照片，作了报道。这时，先生对美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好感。1940年后，先生发现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美国拐骗和迫害华工的大量资料后，完全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

1942年9月，先生离开美国国会图书馆，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行深造。1946年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先生曾主编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刊物《新潮》。该刊对国民党贪污腐化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害的情况，给予了揭露。曾引起国

民党的注意和怀疑。他还积极响应留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发起的反对杜鲁门纵容商人，把废铁卖给日本、制造武器打中国的签名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在哥大展开，连主持正义的许多美国老师和学生，也来签名，随即迅速扩展到外校，迫使杜鲁门对这一错误行为，有所收敛。先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日本飞机疯狂轰炸我国金华提出强烈抗议》的公开演说，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如此等等。

先生身在美国，不求闻达，不畏强暴，敢于伸张正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痛斥美国拐骗和迫害华工的罪行，揭露国民党贪污腐化，误国害民。其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1947年，先生受聘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系任副教授。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在美国居住七年以上的外籍移民，即可转入美国籍。入了美国籍，提工资、找职业、买房子等，可以免受歧视。先生却拒绝加入美国国籍。他故国情深，无时不在想念祖国！

1949年冬，先生从斯特朗那里得知新中国诞生了喜讯，心情振奋。在周鲠生等爱国人士的支持与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生毅然辞去华盛顿大学远东系副教授的教职，投奔解放，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任，为新中国服务。

先生在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读书，却未见过他信教；在国民党统治下从事地方志研究和教学工作，却不入国民党和其它政党；在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却拒绝日本人用高薪聘请，不作亡国奴；留居美国十一年，却拒绝加入美国籍，宁愿忍受寄人篱下遭受歧视的痛苦，却以“我是中国人”为荣，不为洋人卖命，回祖国后，却安贫乐道，埋头搞科研和教学工作，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先生每每和我谈起

他的为人与不随流俗的性格时，深有感慨：“我一生清贫，但我无愧于祖国和人民。”这两句话，包涵着多少深刻的意义！先生的高尚情操，永远给我以激励。

海淀相期报国恩

1953年8月，先生经武大校长李达批准，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门做科研工作。是月中旬，我被武大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专业做研究生。我来到北京西郊人大研究生楼（原财经学院旧址）刚一住定，就去城内第三所（原北京大学旧址）去拜访先生。先生喜出望外，带领我参观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即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第二所（即中国中古史研究所），见到了尹达、向达等著名的史学家。先生带我边走边介绍，回到第三所时，见到第三所所长范文澜老先生在办公室，先生兴致勃勃地领我引见。范老连忙放下笔，热情地接待先生和我这个后生，鼓励我学好马列主义理论和历史专业知识，为繁荣新中国文化事业服务。我对范老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有和蔼可亲的长者之风，令人敬仰。先生也表示，范老是从延安来的，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是一位真正的饱学之士，我能在他领导下专门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心情舒畅，一定竭尽全力，为祖国文化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先生还介绍，历史研究所集中了史学界部份精华。你学好理论和专业后，能来这里施展你的才智，会对祖国文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先生如此器重我，给了我以勇气和毅力。此次拜访，收获很大，更明确了必须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学好专业，才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研究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一次，我如约拜访先生，那是北京一所居民住宅四合院，胡同里十分幽静，少有行人。我对准门牌号码，只见大门紧闭，不得而入，打算回去。幸而发现大门右上侧有根铁丝，拉响院里的锅

铃，来人开门了。我见到先生谈及此事。先生哈哈大笑，只怪我和你沒有交代清楚。这次和先生见面，先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很关心，还为我写信介绍他在京的好友，其中有位是武大政治系教授武剑西先生。武先生当时已调到中央高教部当处长，我拿先生的介绍信去高教部，通过门房电话联系后，武先生在红楼办公室前等我，并表示和先生关系很好，对我来人大深造很高兴，有什么需要办的，一定尽力。我感激武先生，更感谢先生。我在京除在人大得到何干之、尚铎先生这样的良师和同班的许多益友，更能得到先生介绍学术界前辈的教导，使我大开眼界，这对我形成爽朗的性格、虚心好学的态度，很有关系。

先生素来多礼，只要有亲朋好友去看望过他，他就要回访，对我也不例外。金秋季节，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先生和分配到三所的武大同班同学单斌一道，专程来看望我，这是对我的鼓舞和期望。我向先生汇报了国庆节时，我和人大同学一道，站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的~~情形~~情形，还汇报了10月4日人大校庆时，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到校祝贺时的热烈情景。先生很高兴地说，人大是在吴（玉章）老领导下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人才之所，你能到这里来深造，是党和人民对你的培养，此恩不可忘！我感谢先生的教导，一定不畏艰苦，向史学高峰攀登。当晚，我写一篇日记，把先生的教导作为座右铭。直至今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能坚持刻苦学习，和怀着报答党和人民养育之恩的思想，是与先生经常言传身教分不开的。我和先生从珞珈山、海淀到1955年以前的接触所写的日记，与先生和学术界前辈给我的信札，其中有不少论学和如何为人之处，很有价值。

心有灵犀通一点

1954年，我服从工作需要，调回武汉工作。先生在北京东来

顺请吃涮羊肉,并请单斌同学作陪,为我饯行。师生相处多年,感情胜似亲人,临行话别,依依不舍,黯然销魂。1955年春节前不久,先生来武汉看望在县华林省十四中学~~学习~~小儿子朱祖成,并及时通知我。我接先生及其公子来,欢度除夕~~深夜~~。席间畅谈各自别后情况,极为融洽。先生表示:我来武汉,首先考虑的是和你见面。我和你第一次共度春节,特别高兴。先生这番话,给了我以勇气和力量,一定要在培养工农干部的教学工作~~中~~做出一番成绩来。

曾任武大历史系教授、我最尊敬的导师之一方壮猷先生,和先生亦甚相得。1955年上半年,方先生在任中南图书馆馆长(今湖北省图书馆),先生返汉时,相约在方先生那里见面。师生三人,无拘束的谈话,感到先生天命之年,有了程含玉老师的照料,很放心。先生后半生的成就,是和程老师精心照料与支持分不开的。

1955年“肃反”运动,先生以所谓“特嫌”受审查。后来得知:先生给周总理写了信。总理在百忙中,关心此事。三所组织上很快弄清了真相,并在会上公开宣布:“朱士嘉同志没有政治问题。”1956年12月,先生被邀参加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归国留学生招待会。会上,总理说到:在肃反中少数受过冤曲的人,我以政府领导人的身份表示歉意。先生被总理宽广坦荡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的精神所感动、所鼓舞,更加努力地报效祖国。

这年,我在“肃反”运动中,以所谓“反领导落后小集团”被隔离审查,我们之间的联系终断了一年。1956年9月,我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理工大学)调来武汉师专(后改为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历史科教书时,有过联系。以后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我成了专政对象,身居逆境,不再和任何人联系接触了。后来,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冯永轩老先生,从方壮猷先生那里

得知，先生调回武汉，处境不佳，但我深表惋惜与同情。我和先生虽中断了联系，仍然两心相通，心心相印。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大约在196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在轮渡上见到先生。我俩惊喜交集，犹形于色。先生看着我，我看着先生，除几句寒暄话外，欲言又罢。话到嘴边留半句，方知逆境作人难。快下船时，先生说，~~某某~~地方志，请我去主持一个县。我感谢先生厚意，表明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身不由己。先生理解我的心情，并告知他在紫阳路的住址，要我到他家去谈谈。我怕连累先生，却越赶不前而罢。

盼来枯树又逢春

一声春雷，苏醒了祖国的大地。打倒“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终于恢复了政治名誉，重新走上了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讲台。

1979年春节前，我按捺不住怀念之情，一个假日的清早，我去拜访先生，问遍了紫阳路街面的住户，仍未得到，只得快快回家。不几天，在省史学会议上，先生从我系高维岳副教授那里，得知我的近况，带信要我去他家叙谈，激动得我一夜辗转难眠。

第二天，我在紫阳路87号进门，穿过一条阴暗的深巷，在几间低矮、狭窄、潮湿、没有卫生设备的小平房里，找到了先生的家。只见先生坐在进门的一间，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文章。一见我来了，连忙起身，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高兴地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强忍着泪水，不约而同地说：“感谢党、感谢邓小平同志！我们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能够理直气壮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四化建设服务，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当时我已是53岁的人了，先生长我21岁。几十年来，先生老了许多，我也显得憔悴，但我们感到很年轻，即使是“三九”寒天，

身、心也是暖融融的。先生一往情深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和先生之间这种患难与共的深情，不身历其境，是难以理解的。

先生素来喜爱我勤于学业，称赞我的文笔。他在美国时间长，往往运用英文，中文有些淡忘了。来武大后，他好象外国人讲中国话一样，不太流利；写文章，先想到英文然后翻译成中文。我当先生的助手，他有些文稿由我执笔，自己写出的也要我提意见。这年上半年，《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湖北部分的编写任务，先生又想到了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希望能在先生身边工作，好聆听教诲。有关单位派两位处长来我校，商谈借调事宜，由于当时各个高等院校师资缺乏，我是武师的骨干教师，主讲“中国历代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程，难于找人接替，只好搁置。但从此，我和先生的接触更频了。

1979年下半年，我建议邀请先生为历史系师生讲方志学。当时武师党委书记李琰同志（解放前后在武大法律系学习，也是先生的学生），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历史系系主任皮明靡表示欢迎，并派我作代表，专程接先生来，在我校行政楼大会议室举行隆重的学术报告会。这是先生恢复政治名誉后所作的第一次学术报告，对此，先生极为兴奋，后来多次说到：“参加学术讨论会或应邀作报告，加深对方志的认识。《中国地方志浅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湖大前身武汉师范学院邀请作报告，是骆老师介绍的。”又说：“通过工作实践，提高（对方志的）认识，比解放前有进步。”（《研究方志的历史回顾》）1981年4月间，先生在杭州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上作学术报告时又说：“《中国地方志浅说》是骆啸声老师介绍我到武汉师范学院作报告的情况下写的。”他曾跟我开玩笑说：《浅说》是你介绍我作报告逼出来的。先生这篇论文，系统、明确地阐明了方志学的特点和性质等方面，是对方志理论的重大贡献，基本上奠定了八十年代初我

国编纂新方志的指导思想。

这年，先生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特邀，参加《方志学论丛》一书的编写工作。该校为先生提供了一套住房，生活照顾得很好。北师大校长白寿彝先生和先生过从甚密，优礼有加，颇有挽留先生之意，希望先生把五十年代武大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介绍到北师大来任教或做研究工作。先生又想到我，来信征求我的意见，但由于家属户口不能迁入北京而作罢。时先生已任命为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完成任务返汉后，又和我谈及此事，称“只要有什么事，我总是想到你。”

1985年9月7日（先生生日是8月7日）教师节前夕，庆祝先生八十大寿，显得更有意义。原定由李夫全副省长主持祝寿仪式，因李副省长在京开会，不能返汉，便改由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负责人密加凡副主任主持。省方志办同志和省文史研究馆部分馆员应邀参加祝寿，先生还特别邀请我参加。在长长的会议桌中间，摆着一个“寿”字大蛋糕，先生坐在长桌中央，右边坐着密加凡先生，我坐在左边，簇拥着满面春风的老寿星。仪式隆重，气氛热烈，密加凡先生致祝词，盛赞先生道德文章，特别是方志学的造诣，对当今修志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随即发表祝词，概述在朱老门下，忝居末坐，追随三十五年，叨聆教诲，铭刻在心，即使是身居逆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况。並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时代表湖北大学、历史系向先生敬献了寿礼。我在寿匾上写着：

朱士嘉先生

荣膺杖朝

湖北大学敬献1985年9月7日

“杖朝”是周朝规定尊老的一种礼制。《礼记王制》：“八十杖于朝。”这个规定具有法律意义，举国上下都要遵守，这也是朝廷对德高望重的长者以最高的荣誉，尊称“先生”，故曰“荣